

陪伴周总理的八年 是我毕生的财富 (上)



◀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在专机上(后排右一为纪东)

感受讲述者:46年前,纪东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周恩来总理走完了最后八年的人生之路。总理逝世后,他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处长;1984年重新入伍,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处长。1987年调任武警总部司令部作战勤务部长、办公室主任。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,授少将警衔。2002年退伍后,担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,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,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宣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上。

纪东说,总理是一部读不尽的书。总理曾说过:人是应该有理想的,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得盲目。总理深谙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,在纪将军看来,无论什么理论,其实用细微的小事诠释起来反而更加鲜活和充分。他在总理身边的八年里,亲历过一次次重大事件,见证过一个一个关键决策,但是,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个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的动人瞬间。

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题

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书,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,我陪伴了他8年时间,亲历了“文革”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,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、苦撑危局的艰难岁月。

1961年,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,部队番号“3747”,也就是后来的“8341”部队——中央警卫团。1968年7月,我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。一天,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。我的发言简明扼要,自然连贯。没想到,仅仅5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。8月12日,我奉命“到杨政委家谈话”,杨政委问我:“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,你愿不愿意去?”我立正回答:“报告首长,我愿意!”杨政委特意叮嘱我:“对邓大姐就叫‘大姐’,对周总理就称‘总理’,千万不要称‘首长’,不要说‘请指示’,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。”

从整理电报开始,我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、收发文件、文电送阅、会议通知、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。几个月里,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“对不起,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,抽空我要和你谈话”,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,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到身边,说:“小纪,真对不起,你来这么长时间了,我几次说和你谈谈,可一直没有时间,让你久等了。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。现在看来,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,我这里的工作情况,你基本上都知道了,对你来说,工作岗位变了,接触的事情多了,我只提一条要求,不该说的不要说,要注意保密,这是纪律。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,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。”

按照分工,我负责党、政、军、群这

几方面的秘书工作。尽管总理一生为公,一生奋斗,从来没有轻松过,但因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殊性,我在他身边的8年是他最累、最难的8年。

总理爱听京剧,爱打乒乓球,爱和孩子们在一起,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,更谈不上这些“享受”。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,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。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,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。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,我们心如刀绞,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,但他总是说:“我也想休息,可我歇得了吗?我是国家的总理,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?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?再累也得坚持啊!”

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,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。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。总理一生大风大浪,从未怕过死。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。每次做大手术前一两天,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,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。当我们含着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,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:“不一定,两种可能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,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,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,如果下不来,这就是诀别。

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。他也是血肉之躯啊,他不知道累吗,不知道困吗,不知道疼吗?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,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。记录显示,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,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,同人谈话233次,会见外宾63次,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,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,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!

担当 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

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。

作为秘书,我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,这种苦和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:累、气、忧、愤。1970年夏天,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,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,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:不公与不干。做天难做二月天,蚕要暖和参要寒,种菜哥哥要下雨,采桑娘子要晴天。

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,需要协调各方关系,兼顾各方感受,众口难调,难上加难。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、保密观念极强的人,所以,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。我想,总理写这几句诗,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。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,一觉醒来,马上接着忘我工作。不管多大委屈,只要是中央决议,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,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。所以,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,我却觉得,他的忍,绝不是后退、泄气和消极,而是顾全大局,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。有个成语叫“忍辱负重”,一个人,特别是一位政治家,忍不得辱,就难负得起重,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,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!

1973年3月7日,总理出席中联部、外交部举办的庆“三八”招待会。“文革”以来,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,总理说:“这个责任我们来负。作为政府负责人,我负更多的责任。”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,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,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,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。这就是我们的总理,在他看来,国家利益面前,个人颜面又算得了

什么?

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撑,一是胸怀坦荡;二是心底无私。凡是认识到的错误,绝对承认,马上改正,批评先自我,揽过不推责。而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,他既不追究也不疏远。在我的印象中,从没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,也从没听到他说过“这事不归我管”。

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,善待那些敢讲真话、实话甚至“冒犯”领导的人,折射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,在这方面,总理堪称全党楷模,他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。

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,刚从“牛棚”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,每次开会,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。会间,他还要问一声:“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?”我知道,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,他不止一次地说:“林一山敢提意见,总得有对立面,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。”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。

每遇重大问题,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,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。他常对我说:“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,又要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”何香凝去世后,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,时隔几日,总理冒出这么一句:“要是把‘先生’改成‘老人’该多亲切啊。”这说明,只要关乎国家发展、民族团结,无论大事小情,他都不会浅尝辄止,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。

(讲述 纪东 撰文 马宇彤)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